

鲁迅与李大钊 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

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主将的鲁迅,他与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的交往是从开办《新青年》杂志开始的。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小说、杂文、诗歌共计 54 篇,不算多也不算少。与陈独秀、李大钊相比,鲁迅在文化上和他们有共同追求,又有着明显的个人执守。鲁迅与陈独秀其实是神交为主,那么,他与李大钊又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?

“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”

李大钊(字守常)比鲁迅年轻 8 岁。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,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、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。

比起陈独秀,可以判定鲁迅与李大钊有更确定的现实交往。1933 年 5 月 7 日,鲁迅在致著名记者曹聚仁的信中,明确说“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”。而认识的“桥梁”是《新青年》。“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,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《新青年》的集会上,这样就算认识了。”鲁迅谈陈独秀时只谈过他的“韬略”之有无,而对李大钊,鲁迅则直接描述了他的相貌,而且不止一次地谈到李大钊特殊的形象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。“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,有些儒雅,有些朴质,也有些凡俗。所以既像文士,也像官吏,又有些像商人”。

因为是教育部公务员的身份,鲁迅迟至 1920 年 8 月方被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聘为讲师。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之后,鲁迅与李大钊的见面

应该就有很多机会了。

从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会议到北京大学的同事,鲁迅与李大钊的交往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事。虽然鲁迅一开始还“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”,但在文化上视其为“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”却是坚信不疑的。

纷争与共识

作为《新青年》的作者,鲁迅贡献了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风波》《故乡》五篇小说,发表了数十篇杂文,鲁迅为数不多的新诗也多见于《新青年》上。今天再翻开《新青年》,可以看到鲁迅与李大钊名字的并列,也可以想像李大钊作为轮值编辑为鲁迅文章付出的辛苦。鲁迅、李大钊的交往也在鲁迅日记里留下了印迹。

1919 年和 1921 年,鲁迅与李大钊的通信往来共有 9 次。其中有些信件与《新青年》办刊方向的争议与协商有关,而由此引发的争议,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。

1920 年开始,《新青年》随陈独秀南下上海编辑出版。因为陈独秀的志趣以及陈望道参与编辑,《新青年》的政治色彩渐浓,胡适则对此表示不满。这一年年底的 12 月 16 日,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致信胡适与高一涵,表达了“今后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”的意愿。胡适收到此信后回信陈独秀,提出《新青年》的三种办刊办法,一是“听《新青年》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,而另创一个哲学文艺的杂志”。二是“将《新青年》编辑的事,移到北京来”,且“声

明不谈政治”。同时并将陶孟和意见附上作为第三条办法,即刊物“停办”。胡适还将此信寄给了李大钊、鲁迅等北京同人征求意见。

远在广东的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件后,反应非常激烈。他即刻致信李大钊表达自己的观点,并把致胡适和致陶孟和信一齐附上。李大钊收到陈独秀的信后,觉得兹事体大,应该让在京同人各自表达下自己的意见。

胡适收到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信件后,去信批评陈独秀:“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,我实在有点怪你。”而鲁迅的态度很明确,“寄给独秀的信,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”,“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,我却以为不必”,因为“凡《新青年》的作品,无论如何宣言,官场总是头痛,不会优容的”。

其实,只要不是第三种“停办”就可以。这应该是北京《新青年》同人的共识。李大钊在 1921 年 1 月 21 日、23 日、25 日,先后致信胡适,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特别是希望团结共事的愿望。

无论结果如何,这场争论意义十分值得珍视,它不但反映了新文化阵营对《新青年》办刊宗旨的态度分歧,反映了每一个人对时势和事业的看法,更彰显了他们可以求同存异,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风范。李大钊在其中既起到了协调作用,更体现出超强的大局观。陈独秀也最终和胡适达成原则上的互相理解。因为陶孟和的“停办”说引起陈独秀的不满,胡适以朋友的身份进行劝解和批评。陈独秀在信中表示:“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”,“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”。也算是文坛佳话吧。

一个“钊”字引发的趣谈

鲁迅一生当中至少认识三位名字里带“钊”的人。一位是青年时期

在南京上学时的同学,叫沈钊;一位是在北京教育部做公务员时的顶头上司,教育总长章士钊;还有一位就是李大钊。这三位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各自都因为名字里有个“钊”字而引发出故事。

鲁迅在杂文《忽然想到(八)》中讲述与李大钊有关的轶闻:“曹锟做总统的时代,要办李大钊先生,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:‘只要看他的名字,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。什么名字不好取,他偏要叫李大钊!’”于是乎办定了,因为这位‘大钊’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,是‘大刀王五’一流人。”

也真是有趣,同样是在《忽然想到(八)》里,鲁迅写道:“一个新的职员到校,势派非常之大,很傲然。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‘沈钊’的,就倒了楣,因为他叫他‘沈钧’,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。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,就叫他为‘沈钧’,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。两天之内,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,再记一小过,就要开除了。”

带给鲁迅更直接触动的“钊”字人物,是教育部时任总长章士钊。1925 年 5 月 12 日的《京报》“显微镜”栏目发表了这么一条文字:“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‘章士钊’五七呈文,愀然曰:‘名字怪僻如此,非圣人之徒也,岂能为吾齐鲁古文之道者乎!’”这是一个故意寻求“开心一刻”的“段子”,是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据《鲁迅全集》注释,“显微镜”作为《京报》的一个小栏目,专发“短小轻松的文字”。其时,鲁迅因“女师大风潮”与章士钊等进行笔战,正好借此来发表一番冷嘲热讽的议论。

一个“钊”字竟能生发出这么多故事,而且“派生”出三字不同的白字:剑、钧、钉,也实在有趣。这或许也只有鲁迅的杂文能做到。

据《雨花》 阎晶明/文

戴笠为邀功“指鹿为马”

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上海,当共产党人被捕后,他们受到酷刑。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,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。而特务们理所当然地认为,你若抓住一个共产党人,就要毫不例外地对他上刑,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。

这使得掩盖错误变得很容易。其中有一次,特务处上海站一个组的外勤特务们对一个姓马的人发生兴趣,于是他们自己就装成“进步人士”努力向马某靠拢,认为他是个重要的共产党地下干部。一个 20 多人的别动队成立,并在马某身上花了上千元。这似乎都是值得的,因为马某有关于地下共产党的可信的情报。

这份情报被送到了戴笠手上,他对特务们的成功很高兴,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。之后,他们断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,这组特务们决定逮捕马某,并对他进行审问,争取尽快结案。但当他们把马某抓起来审问,说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务时,马某立刻告诉他们,他自己也是假装的“共产党叛徒”,为在上海的其他特务们工作。这些特务迅速与那组特务核实,发现他说的是实情。他以前确实是个共产党员,但此刻是作为一个“叛徒”在为上海站其

他组特务工作。

戴笠得知这场误会火冒三丈,骂负责上海站的特务是“饭桶”。结果,上海站的特务又把负责马某案的人痛骂了一顿,并威胁要对他们进行处罚。

但为时已晚,蒋介石已被告知特务处要逮捕一个共产党华东局的负责人。因为不愿丢丑,戴笠狡猾地对沈醉说,他相信马某真的是他所假装的共产党负责人。

戴笠说:“这家伙竟敢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,好在发觉尚早,不然要吃他的大亏!”既然犯罪和判刑全都由特务处决定,马某便被押送到南京,成了牺牲品。

一般说来,上海站的特务越跟共产党地下人员打交道,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。这些特务的谨慎是有道理的,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们有时会发现,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,危险也随之而来。

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(中共叛徒)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。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,王克全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,想劝说他们,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。从此以后,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,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。 据《老年文汇报》